

重審單士釐《癸卯旅行記》中的女性書寫

劉佳霏

摘要

作為晚清唯一一部女性遊記，單士釐的《癸卯旅行記》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晚清女性遊記視角。本文將從《癸卯旅行記》與其他遊記的對比中分析中，糾正過往研究中的偏差認知，發現真正的書寫特質，從而認識到作者在社會性別規範下表現出的陽性書寫表演。

關鍵詞

單士釐 《癸卯旅行記》 女性文學 近代文學 旅行文學

一、緒論

單士釐（1863-1945）出生於浙江蕭山的一個書香門第，與晚清外交官錢恂（1853-1927）成婚後，隨夫出使日本。1903年，他們於日本出發，經上海、朝鮮、滿洲抵達俄國彼得堡。單士釐記錄了這段為期71天的旅行，並以《癸卯旅行記》之名，於1904年出版。此書剛剛問世的時候，並沒有引起大範圍的關注。¹直到鐘叔河在20世紀80年代將《癸卯旅行記》收入《走向世界叢書》出版開始，單士釐及其作品才得到了學界的關注。單士釐作為傳統閨秀的代表在晚清這一歷史轉型時期是如何看待異國與本土的差異；與過去的傳統閨秀相比有哪些不同；她選擇記錄材料的背後有哪些動機；其書寫方式究竟因何有別於男性作者，都值得我們探索並從中了解性別與社會環境是如何影響了書寫方式。

我們目前所知最早有關單士釐的文章，是鐘叔河1981年出版單士釐兩本遊記時所作序言。隨後，一些介紹單士釐生平的文章相繼發表。80到90年代，對於單士釐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內容介紹層面。進入20世紀，人們對於單士釐的研究逐漸深入，絕大多數文章集中於單士釐女性思想與國族思想的研究上。囿於篇幅所限，本文只討論其女性書寫的特點。

¹ 據姚振黎考證，陳香《清代女詩人選集》、汪祖華《中國女性詩詞集抄》、沈立東、葛汝桐《歷代婦女詩詞鑒賞辭典》、陳燕《清末民初文學思想》附錄文人簡表皆未錄入單士釐作品，唯胡文楷（1899-1988）《歷代婦女著作考自序》提及單士釐所編《清閨秀藝文略》，參姚振黎：〈單士釐走向世界之經歷——兼論女性創作考察〉，載范銘如主編：《第二屆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學生書局，2003），頁257-296。另，《中國基本古籍庫》和鄭光儀主編的《中國歷代才女詩歌鑒賞辭典》（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1）也未見收錄單士釐的任何作品。

在單士釐的女性意識上，早期學者如鐘叔河，將單士釐視作蔑視封建禮法的女性革命先驅。²¹世紀以來，更多人注意到了單士釐所處的特殊時代與她有著矛盾的女性意識的關係。陳室如探討了單士釐性別意識中的模糊糾結之處，既以實際行動書寫和開啟了晚清女遊，又無法脫離傳統女德的堅持，她提出單士釐在作品中呈現了不徹底的性別覺醒。²羅秀美她分析了單士釐是如何從女性的視角凝視西方，並回顧東方進行女性文學傳播。³在女性思想上，儘管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已經逐漸認識到單士釐女性思想中矛盾的一面，卻鮮少有人將其女性思想和書寫方式聯繫起來。

關於單士釐遊記書寫方式的研究不多，汪年認為單士釐遊記的特點在於主題內容的豐富性和形式的多元化。⁴實際上這幾乎是近代遊記的共同特點。另一方面，顏麗珠認為單士釐能夠純熟的運用寓情於景和對照比較的寫作技巧，是她書寫的一大特色。而且，單士釐在篇章佈局和成書格式上也別具匠心。⁵這種特色在僅將單士釐作為女性遊記作家進行考察時是存在的，然而如果將單士釐與其他域外遊記作者一同考察，這種結論是否成立還有待商榷。王璐璐指出單士釐以其女性化的細膩筆觸和女性化的抒情與描寫，展現出了不同於男性作者的獨特書寫特質。⁶安麗敏同樣認為單士釐的寫作手法細膩感性，有別於男性作者。⁷

Sara Mills 提到，「一般女遊文學批評家普遍假定女性書寫不證自明地不同於男性書寫，不過極少批評文章驗證過女性書寫與男性書寫作品之間的相似特質。」⁸本文主要通過將單士釐的遊記與同時期男性遊記進行比較研究，以探討她的書寫方式究竟如何區別於男性並探究其成因。另一方面，將單士釐與明清時期才女相對比，可以揭示單士釐遊記書寫方式中既傳統又現代的雙重面貌。

二、單士釐遊記的書寫特色

（一）被誤解的女性化寫作

作為晚清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的女性域外遊記，人們自然地關注單士釐作為女性這一重身份，得出女性寫作細膩、感性，有別於男性寫作的觀點似乎也順理成章。例如安麗敏與王璐璐都認為：單士釐的女性書寫特質是女性化的細膩筆觸與女性化的抒情和描寫。⁹王璐璐將單士釐與梁啟超（1873-1929）相比，認為：

² 陳室如：〈閨閣與世界的碰撞——單士釐旅行書寫的性別意識與帝國凝視〉，《彰化師大國文學志》第13期（2006年12月），頁257-282。

³ 羅秀美：〈流動的風景與凝視的文本——談單士釐（1856-1943）的旅行散文以及她對女性文學的傳播與接受〉，《淡江中文學報》第15期（2006年12月），頁41-94。

⁴ 汪年：〈單士釐域外遊記研究〉（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⁵ 顏麗珠：〈單士釐及其旅遊文學——兼論女性遊歷書寫〉（臺灣國立中央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

⁶ 王璐璐：〈近代女作家單士釐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⁷ 安麗敏：〈單士釐的世界之旅及其思想認識研究（1898-1912）——以撰主的兩部遊記為中心的考察〉（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⁸ Sara Mills 著，張慧慈譯：〈女性主義批評中的女遊書寫〉，《中外文學》27卷12期（1999年5月），頁6-28。

⁹ 安麗敏：〈單士釐的世界之旅及其思想認識研究（1898-1912）〉，頁12；王璐璐：〈近代女作家單士釐研究〉，頁46。

男性作家喜好運用議論手法表達出對於世界局勢和潮流，以及中外差距等的看法和觀點。¹⁰

她引用了梁啟超《新大陸遊記及其他》中的議論作為證據。不過二者雖同為 1903 年出國，時間相近，但是二者遊記中不同的書寫特質，卻不僅由性別差異導致，而應當是更多的由作者身份，寫作目的而決定。

單士釐出生於浙江蕭山的一個書香門第，她自小便居住在外祖父家，隨舅父讀書，學習詩文，接受的訓練是完全符合中式傳統的。一位傳統的閩秀寫遊記的目的必然不能是傳播自己的思想，因為那樣是不符合婦德的。單士釐在作者自序中謙虛地寫道：

惟此一段旅行日記……我同胞婦女，或亦覽此而起遠征之羨乎？跂予望之。¹¹

很明顯，單士釐的寫作目的是為了使同胞婦女們增長見聞，了解世界，讓更多人得以「開眼看世界」。相應的，《癸卯旅行記》中對異國風物的描寫、記敘也就多些。考慮到當時婦女的識字率，¹²《癸卯旅行記》的預期讀者群可能比他們宣稱的還要少些。在當時指望廣泛流傳的面向大眾，特別是婦女的書籍大多會加上插圖以便不識字的人也能理解，而沒有插圖的《癸卯旅行記》的目標讀者顯然只能是極少數受過良好教育的上層婦女，以及部分男性。

梁啟超的《新大陸遊記》則是戊戌變法失敗後，其流亡海外過程中，遊歷美洲，考察共和政體，在各地發表演講，鼓吹自己的學說時的經歷。作為一名政治家，一定會對外國的政治體制、社會發展情況特別敏感。為了宣揚自己的思想，他的遊記中政治性議論、中西政體的比較自然占了大部分篇幅。梁啟超自己也在《新大陸遊記》凡例中提到：

中國前此遊記，多紀風景之佳奇，或陳宮室之華麗，無關宏旨，徒災棗梨，本編原稿中亦所不免。今悉刪去，無取耗人目力，惟歷史上有關係之地特詳焉。

¹³

可見《新大陸遊記》中通篇大多是政治議論性議論，是作者有意為之的結果。它不僅與單士釐遊記記錄內容相差很大，與絕大多數之前的中國遊記也是大相徑庭。梁啟超確實比單士釐多了許多對國際形勢、政治的議論對比，但是將梁啟超與晚清大多數男性遊記作者相比，恐怕也能得出相同的結論。因此，將梁啟超與單士釐進行比較，得出女性遊記作家相較男性更少議論而更多抒情描寫的結論，恐怕是片面的。

（二）單士釐與同時期男性作家比較

¹⁰ 王璐璐：〈近代女作家單士釐研究〉，頁 51。

¹¹ 錢單士釐著，楊堅校點：《癸卯旅行記·歸潛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頁 22。

¹² 據 Evelyn S. Rawski 的估計，清代婦女的識字率大概在百分之一／二至十。“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estimates placed the female literacy rate at only 1-10 percent” (p. 6); “Basic literacy was unevenly distributed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with perhaps 30 to 45 percent of males and only 2 to 10 percent of females possessing some ability to read and write.” (p. 23) 詳參氏著：《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Ann Arbor,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¹³ 梁啟超：《歐洲十一國遊記二種·新大陸遊記及其他》（長沙：岳麓書社，1985），頁 419。

既然梁啟超不宜作為晚清男性遊記作者之代表，我們就應當選擇與單士釐情況更相近的作者與之進行比較。在單士釐出遊的前後，有張德彝（1847-1918）與戴鴻慈（1853-1910）這兩位出使大臣留下了遊記。

在身份上，我們前面已經提到，單士釐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傳統閩秀。她的丈夫錢恂，按照丘巍的說法，在 1903 年時曾作為參贊赴俄。張德彝撰《八述奇》時任英國大使，授二品官銜；戴鴻慈出使時任從二品戶部侍郎（錢恂也在此次「五大臣出洋」的隨員）。雖然錢恂的官階要低於其他兩人，但他們都屬於外交官員，相對於梁啟超，他們看待事物都帶有一些官方色彩。

在出遊動機上，單士釐的旅行是隨夫出行，並無公務在身。寫下遊記的目的是讓女性為主的親友同胞們增長見聞，書寫相對隨意。張德彝是奉旨出使英國執行外交事務，考慮到要上呈政府，所記述的內容應該會受到一定限制。但是清政府對出使人員的日記並沒有固定要求，各個出使大臣的日記也是形態各異。張德彝為自己的遊記命名「述奇」，這顯示了他偏好在遊記中描寫外國的奇異事物，與單士釐希望能讓讀者增長見聞的寫作目的是很相近的。這也是本文將張德彝的遊記同單士釐的進行比較的原因之一。而戴鴻慈的出使擔負著考察外國政治制度以改良本國政體的任務，顯然他會對國外的政治體制給予更多關注，遊記的內容也會更嚴肅。

在出遊時間上，單士釐的《癸卯旅行記》記錄的是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十七日（1903 年 3 月 15 日）到四月三十日（1903 年 5 月 26 日）共 71 天的旅行經歷。張德彝《八述奇》¹⁴第一卷的內容是自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八日（1902 年 3 月 17 日）啟程到五月十一日（1902 年 6 月 16 日），共 93 天的經歷。戴鴻慈《出使九國日記》¹⁵前四卷記載的是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1905 年 11 月 27 日）到光緒三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1906 年 2 月 14 日）共 70 天的行程。

我們姑且按照王璐璐進行比較時採用的描寫景色、議論、字數、圖示、列舉這些寫作手法，將三者遊記中出現天數統計如下（一日中提到多次視為一次）：

作者	出遊身份	遊覽 天數	寫景 天數	議論 天數	運用數位 天數	運用圖表 天數	列舉說 明天數
單士釐	官員家眷	71	7	21	12	2	3
張德彝	外交大使	93	6	7	37	0	1 ¹⁶
戴鴻慈	政治考察 大臣	70	6	8	42	2	12
單士釐使 用頻率			9.9%	30%	17%	2.8%	4.2%
張德彝使 用頻率			6.5%	7.5%	45%	0	1%
戴鴻慈使 用頻率			8.6%	11.4%	60%	2.9%	17%

¹⁴ 張德彝：《八述奇》二十卷稿本，北京圖書館藏。

¹⁵ 戴鴻慈著，陳四益校點：《出使九國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¹⁶ 另有八次羅列所見人名官職，因個人認為不屬於列舉說明，故不列為記錄。

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出，儘管兩位男性作者是公務出行，而單士釐是私人旅行，他們在描寫景色、運用圖表方面的頻率卻相差不大。三者相差較大的地方主要是議論和數位說明。單士釐使用數位說明的次數要少於兩位男性。原因在於，張德彝雖然運用數位次數較多，但他在乘船出使的途中每日記錄經緯度佔了大部分。如果我們扣除張德彝日記中重複的每日記錄航海座標的部分，單士釐運用數位說明的頻率與張德彝並沒有太大差異。戴鴻慈遊記中運用數位說明則更多樣化，特別是考慮到他的出使背負著考察政治的使命，他對外國的建築、機械的描寫非常精細。例如在考察美國郵輪時，對郵輪的尺寸、載重，時速都有記錄。¹⁷單士釐對數位的表述與戴鴻慈相似，只不過頻率更低些。不過我們應當注意單士釐似乎很少像戴鴻慈那麼注意船舶器械的具體細節。顯然，以她的身份，所能接觸到的船舶、機械、建築的資料會比身為考察公使的戴鴻慈少得多。但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單士釐考慮的目標讀者——上層女性——對機械具體資料資訊的記錄不感興趣。在三者之中，如果我們扣除張德彝遊記中重複的地理位置記錄，單士釐運用數位說明的頻率應當居於戴鴻慈與張德彝之間。因此，通過使用數位說明的頻率來證明單士釐的書寫方式更「女性化」，顯然也是難以成立的。相反，單士釐遊記中發表的議論要遠遠多於另外兩名男性官員。在內容上，單士釐對國際關係、政教經濟等各個方面進行了議論。而張德彝則是偶爾對一些外國風俗發表極簡略的議論。戴鴻慈對於社會的觀察通常以按語的形式附在每日的末尾，他的評論與單士釐對社會民生的關注也有相似之處，只不過單士釐談論的次數要多得多了。

通過以上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單士釐與另外兩位男性作者相比，並沒有更多的運用抒情手法，其遊記中的議論的甚至遠多於男性作者。如果我們單單將單士釐的遊記和張德彝、戴鴻慈的相比較，單士釐甚至更「男性化」。由此可見，單士釐遊記的書寫方式並不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麼「女性化」，她反而是在以女性作家身份進行「男性」書寫。對於此種現象，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她需要以「男性」的書寫方式來掩蓋自身書寫正當性的焦慮。

（三）單士釐遊記的書寫特色

眾所周知的是，長久以來在中國歷史上極少有女性能發出自己的聲音。到了清代早期，因為女性識字的人數逐漸增多，連女性是否應當讀書識字也處於爭議之中，更不用說書寫自己的思想了。劉詠聰認為：

雖然清代前期鼓勵女性學習詩文的主張並不孤立，但傳統的勢力還是相當強的。這間接使到「有才」的女性容易陷入內心矛盾、掙扎的困苦境地中。一方面她們服膺傳統禮教，另一方面卻又若有所不甘。¹⁸

單士釐生活的清朝末年，鉗制女性的性別枷鎖有所鬆動，西方人引進的「戒纏足會」、「女學堂」也不斷湧現，然而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傳統性別角度社會結構，不是能夠輕易轉變的。

事實上，單士釐並非第一位隨丈夫走出國門的女性。在錢恂之前的一些外交人員也曾偕家眷出國，然而幾乎沒有留下什麼記載。郭嵩燾（1818-1891）的女眷在國外參

¹⁷ 戴鴻慈：《出使九國日記》，頁49。

¹⁸ 劉詠聰：《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頁269。

與了社交活動，還引起了軒然大波。¹⁹直到曾紀澤（1839-1890）在1878年至1886年偕妻子、兒女及妹妹出使法、英、俄國，才首次在日記中留下了大量記載家眷活動的寶貴記錄。相較於更早期的外交遊記，曾紀澤的日記是一大進步。但曾氏婦女們並未親自寫下關於國外生活的記錄，²⁰我們只能從曾紀澤日記中的隻言片語了解其在國外的活動。而這些隻言片語，基於當時的道德標準考量，也有可能是刻意模糊、刪改後的結果。

單士釐在國外的生活，也被有意無意的隱去了。她在遊記中記錄青年拜訪時提到「予固老矣，且恒與外國客相見。」²¹這說明單士釐在日本時也經常參與交際活動，但無論是錢恂還是單士釐，對於在日時與外國人的交際活動都沒有具體的記錄，只有《癸卯旅行記》中還存有一些對外國友人的回憶。在這種情況下，她的遊記顯得尤為寶貴。通過對其遊記書寫特色的考察，我們可以了解她對女性主體體認的複雜之處。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的象徵秩序理論認為：

語言屬於象徵秩序，主體正是通過語言表達欲望和情緒，而且主體自身也是象徵秩序的結果。……語言造成了人們與客觀事物之間的分裂，語言使每個人掌握「我」這一概念。因此，語言創造了人的主體性。²²

個體的主體性是通過他人的言語構成的，個體的字語又體現了自身的自我理想與理想自我。單士釐在遊記中塑造出了非常鮮明的「男性化」而又不逾禮教的理想自我形象，然而重點是她為什麼要這麼做。

1. 女性書寫禁忌焦慮

明清時期，女性作家的身影越來越多的出現在人們的視野，對於女性創作的懷疑也隨之增加。呂坤（1536-1618）在出版《閩范圖說》時，特意在序言中批評了那些玩弄文辭的女性：

乃高之者，弄柔翰，逞騷才，以誇浮士；卑之者，撥俗弦，歌豔語，近于倡家，則邪教之流也。²³

魏愛蓮在研究 17 世紀中國才女們的書信時發現，將這些書信結集出版的男性出版者，也在擔憂女性習得文才會阻礙她們履行相夫教子的天職。例如：汪淇（1605?-1669）鼓吹才女命薄之說，以為聰明女子不應涉及文教，教育女子的危險如吃豚魚；黃周星（1611-1680）在信中評說，汪淇本人亦有一個聰穎過人的女兒，而他故意不教其識字，

¹⁹ 劉錫鴻參郭嵩燾罪狀之一便是令小妾學洋語，四處應酬，敗壞中國閩教。全文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摺」03-7600-061 號，參楊錫貴：〈首任駐外公使郭嵩燾被參五摺析〉，《文史博覽（理論）》2012 年第 11 期，頁 9 及頁 10 注 27。

²⁰ 據林維紅研究，曾紀澤在國外有十餘封書信存世，惜內容以醫病、問候為主，幾乎沒有對西方文化的記錄與感想。參林維紅：〈面對西方文化的中國女性：從《曾紀澤日記》看曾氏婦女在歐洲〉，載羅久蓉、呂妙芬主編：《無聲之聲（Ⅲ）：近代中國的婦女與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217。

²¹ 錢單士釐：《癸卯旅行記·歸潛記》，頁 36。

²² Jacques Lacan, translated by Bruce Fink, "The Function and Field of Speech and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 in *Ecrits: A Selec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219-220.

²³ （明）呂坤：〈閩范序〉，《呂新吾先生閩范圖說》，清康熙呂應菊重刊本，頁 1 下-頁 2 上。

而汪淇以為此舉是促使女兒至信完成時已有十年美滿婚姻的原因。由此例可知，女子的婚姻及外貌遠比才華重要。²⁴

另一方面，一些如汪淇、黃周星這樣的文人，雖然也承認女性有能力創作出優美的文學作品，卻不鼓勵女性讀書作文。因為讀書會使女性的思想過於活躍，不利於女性柔順謙卑理想人格的形成，也就不利於婚姻的幸福。正如高彥頤在研究明末清初印刷文化的發展與女性受教育的普及時談到：

但婦女識字率的提高，並沒有減弱儒家道德的控制。實際上，宣揚儒家意識形態的媒介物，從未像現在這樣強有力和具有滲透性。……她們編寫詩、歌以教授其他女性忠誠的美德。換言之，女性讀者兼作者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標誌著儒家社會性別體制的強化，而不是它的消亡。²⁵

總體來說，傳統儒家秩序對女性創作抱有不歡迎態度的原因之一，是顧慮女性的「不務正業」會影響她們為家庭履行應盡的義務。而單士釐與她的前輩女性作家們在自己的作品中特別提倡女德的原因之一，便是向世人昭示，她們不敢忘記自己的女性身份，不敢將創作置於婚姻、家庭之前。

在書寫方式上，單士釐明顯不如我們後面要提到的王鳳嫻（1573-1620）那麼「女性化」，除去二者的個體差異，單士釐的「男性化」寫作並不是個孤例。明末清初的才女王瑞淑（1622-1702？）同樣有著男性化的寫作風格。高彥頤評價她：

王瑞淑不僅擅長男性喜愛的風格和心安理得地裝出男性的聲音，她還在傳統上被視作男性的題材上勝出。²⁶

通過男性化的寫作，王瑞淑獲得了當時評論家的認可。值得注意的是，王瑞淑生活在明末清初而單士釐生活在清末民初，同樣動蕩的社會背景可能激發了她們對於民族、國家這些「男性化」主題的關注。除此之外，她們的男性化書寫還有其他原因。江振勇提到：

20世紀初年的中國，男性是普遍意義（universal）下的「人」；與之相對，女性只不過是特殊的狹義意義下的「人」，或者，更精確來說，是男性的「他者」（other）。²⁷

幾千年來，文學創作是一個絕大多數參與者是男性，絕大多數規則制定者是男性的遊戲。在這種遊戲規則下，一位女性想要躋身此前幾乎由男性壟斷的文人行列，需要在書寫上做得「像男人一樣好」才能獲得肯定。

單士釐曾提到中國有女德而無女學，她自身就是讀男性的書籍、受男性的教育長大的。不管是外部大環境還是家庭小環境中都深受儒家傳統道德影響的單士釐，在進

²⁴（美）魏愛蓮（Ellen Widmer）著，劉裘蒂譯：〈十七世紀中國才女的書信世界〉，《中外文學》22卷6期（1993年11月），頁71。

²⁵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閩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67。

²⁶同上注，頁140。

²⁷江振勇：〈男人是「人」、女人只是「他者」：《婦女雜誌》的性別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2期（2004年12月），頁40。

行面向公共領域的書寫時很難不感到焦慮。女德典範之一的班昭（約 45-117）在《女誡》中這樣解釋婦德「夫云婦德，不必才名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²⁸這昭示著單士釐以注重婦德的上層婦女身份進行寫作的尷尬地位，她著書揚名（儘管她的本意可能不是揚名）的行為自然不符合傳統文化中對女性貞靜、內向的要求。在單士釐被注視之初，她曾被視作一個傳統禮教的反叛者。她關於婦女外出步行的言論被作為證據不斷引用。但結合下面關於女德的長篇大論來看，單士釐並不敢以這種行為為榮，反而在此之後馬上對兒媳發表了一通關於女德的教誨，以表明自己並不敢忘記女德女誡。

予謂論婦德究以中國為勝，所恨無學耳。……近今論者，事事詆東而譽西，於婦道亦然。爾慎勿為其所惑可也。²⁹

在她的觀念中，女性在公開場合進行交際活動固然是優美的，但是終究違背了禮教。單士釐對於女性在公開場合發表言論的矛盾心理，擔憂自己行為「越禮」的焦慮由此可見一斑。為了維護自己公開發表言論的正當性，《癸卯旅行記》以錢恂的序言作為開端，表明此書是經過單士釐的監護人——她的丈夫的審閱而出版的。同時，錢恂的陪伴也極大增強了單士釐出遊的正當性。她不是為享樂而出遊，而是「從夫」而遊，符合儒家傳統「三從」的要求。

顏麗珠認為，單士釐的出遊顛覆了傳統「男遊女怨」的旅遊觀，³⁰她不再是在家中等待丈夫歸來的怨婦。然而從夫出遊與主動出遊畢竟還有很大的差別。高彥頤指出，早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士大夫家庭中，婦女出行已經不會被視作僭越：

妻、女陪同官僚赴其遠任更為常見。小腳可能會減慢遠行的速度，但坐在轎上、車上、船上的上層女性，都帶著一種責任和歷險的感覺渴望著動身。通過在赴任途中或在遠任上服侍父親或丈夫，她們遵從著「三從」的字面含義。³¹

單士釐作為第一位走出國門並留下遊記的女性當然極具開創性，然而「從夫」出遊這一行為本身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傳統。

除此之外，單士釐還在遊記中大量記錄了丈夫的言行，為期 71 天的旅行中，有 40 天記錄了錢恂的言論或行為。這充分顯示了傳統婦德的要求，即一名已婚婦女的生活應當是以自己的丈夫為中心的。不僅如此，單士釐還詳細的記錄了錢恂對於事物的議論，比如在日記中引述一些錢恂對於女子教育的議論，並感到「細想誠然」。³²在遊記中，單士釐的觀點總是與錢恂保持一致。如果我們對照男性作者的遊記，就會發現晚清男性作者幾乎不會在日記中提到自己的伴侶，更別提記錄她們的言論觀點了。對於這種差異，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大多數女性不像單士釐一樣受過良好的教育，而女性（他們的配偶）的言論通常也不會被視為有價值的，值得記錄的。單士釐與錢恂則是

²⁸ 班昭：《女誡》，收入黃嫣梨編著：《女四書集注義證》（香港：商務印書館，2008），頁 18-19。

²⁹ 錢單士釐：《癸卯旅行記·歸潛記》，頁 31。

³⁰ 顏麗珠：〈單士釐及其旅遊文學——兼論女性遊歷書寫〉，頁 16。

³¹ 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頁 233。

³² 錢單士釐：《癸卯旅行記·歸潛記》，頁 36-37。

一對志同道合的夥伴式伴侶，《受茲室詩稿》中收錄了不少單士釐與錢恂的唱和之作。³³對單士釐而言，錢恂更是她了解世界的一扇視窗。

另外一層更深的的原因是，男性的書寫是天然正當的，他們毋需借助女性的觀點來增強自身書寫的正當性。而對於單士釐而言，女性公開發表言論的禁忌迫使她在發表議論時引用錢恂的觀點，或記錄下錢恂對自己的觀點是十分贊同的，藉此逃避可能面臨的責難，比如女人不應當有主見或者女人不了解家庭以外的世界。

女性書寫禁忌焦慮的另一種表現則是對享樂的回避與國家宏大敘事書寫的氾濫。林幸謙在論及權利與書寫關係時這樣講：

在男尊女卑的宗法禮教基礎上，女性知識份子／作家被困於語言、意義、性別、文化運作的政治結構之中，被逼於遵循陽性書寫，最終往往都落入男陽女陰及良性主從的思維模式——儒家宗法父權的象徵秩序之中。³⁴

這種女性遵循陽性書寫的例子並不罕見，前有古人們推崇的花木蘭式「女英雄」，後有五四時期「莎菲」式的革命女性。單士釐在遊記中也將自己塑造成一個深明大義、憂國憂民的女性士大夫。

與張德彝、戴鴻慈等人的公務出行不同，單士釐此次旅行是私人出遊。然而單士釐卻在文中回避了旅遊的私人性質，我們看到了許多錢恂與地方官員交際的描寫，這以至於《癸卯旅行記》像是一部公務出使日記。不僅如此，單士釐遊記中出現政治性議論的頻率也遠多於張德彝和戴鴻慈，除卻少量的景色描寫之外，她更多的書寫著灰色的社會現實與對國家前景的深深憂慮。這種特點在與她的女性前輩相對比時顯得尤為突出。生活在萬曆年間的王鳳嫻³⁵有著與單士釐相似的早年經歷，同樣是出身於書香門第的，曾伴隨丈夫出遊的上層婦女，王鳳嫻對於出遊的記錄方式與單士釐有所區。我們以王鳳嫻〈浣溪沙·郊行〉這闕郊行詞為例：

曲徑新篁野草香，隨風閃閃蝶衣忙，柳綿飛墮點衣裳。
人在鏡中憐影瘦，燕翻波面舞春長，小橋古渡半斜陽。³⁶

王鳳嫻的郊遊詞精巧優美，符合人們心目中對閨遊詞的想象。我們不難看出，王鳳嫻在出遊時最為關心的是美麗的自然景色，其次是自己嬌弱的身姿。這樣的作品，是符合儒家傳統對女性的要求的，賞心悅目又不喧賓奪主。單士釐早期的詩作也是以這樣題詠自然之景、抒閨秀之情為主的，然而在隨錢恂外出遊歷後，她作詩的筆法和題材都發生了一些變化。1903年5月17日，單士釐在遊記中記錄了俄國鐵路沿線燒荒景象：

³³ 如〈和夫子與孫君慕韓唱和原韻〉、〈再和夫子述懷仍用前韻〉、〈和夫子庚戌元旦用前韻〉。參單士釐著，陳鴻祥校點：《受茲室詩稿》（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頁41-42、48。

³⁴ 林幸謙：〈張愛玲的臨界點：閨閣話語與女性主體的邊緣化〉，《中外文學》第24卷第5期（1995年10月），頁100。

³⁵ 王鳳嫻，字瑞卿，江南華亭人，明末清初人；著有《貫珠集》、《焚余草》，今已軼。

³⁶ 〈浣溪沙·郊行〉，載王昶輯：《明詞綜》，清嘉慶七年（1802）青浦王氏三泖漁莊刻本，卷11，頁3下。

現今列車日日通過，而線路左右數里，尚有數抱大樹火焚不熄者，計非數日不能焚一樹。將謂人力所為歟？一星星之火何以能焚此大樹？且距線路遠者又何說乎？不可思議。惟火光熊熊，如列庭燎，頗悅目耳。³⁷

遊記中的單士釐好奇而不失理性，而在詩歌中，或許是因為「詩言情」的特殊體裁，她的情感展露得更為充沛：

〈西伯里亞道中觀野燒〉

積雪杳無際，野燒光熊熊。
 西洋欲落未落時，雲霞半天相映紅。
 燭龍蜿蜒緣山麓，狐嗥兔竄殲蛇蟲。
 草深風勁火更烈，綿延百里如長虹。
 冰堅地凍雪不解，潤澤土脈滋春融。
 潛回陽和祛冷冽，莫笑阿奴下策出火攻；
 周郎赤壁田單牛，殃敵害民事不同。
 曠原湮沒幾千載，今茲鐵道喜交通。
 從此西伯里亞萬頃地，民勤東作歌年豐。
 要使不耕之地成腴壤，火力乃補造化功。³⁸

與王鳳嫻的〈浣溪沙〉對照觀之，從語言風格上看，單士釐要更「粗糙」些，感情的流露也更直接，不如王鳳嫻含蓄。從主題上看，王鳳嫻歌頌天然造物，單士釐的主題則要現實得多，她關注鐵路交通與耕地問題，讚美工業化為人民帶來的益處。季家珍（Joan Judge）發現，19世紀末20世紀初，維新派與一些歸國留學生發起了對「才女」的批判，認為古代的才女們只知道吟風弄月，賣弄才藝，缺乏愛國精神，才導致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點。³⁹而單士釐的書寫方式，無疑符合了在清末這一危機時刻文人愛國主義高漲的訴求，回避了過往女性文人作品中常有的浪漫歌詠。

單士釐遊記中，寫景的內容還是少數，更多的是她在異國之見聞，與見聞之感受。聽說哥薩克人殘害東省的老幼夫婦，她怒其不爭：「夫哥薩克誠強暴，然四人者，縱無器械，豈竟不能口齧此兵，而默然待死乎？」⁴⁰在得知哈爾濱在俄國統治下已經通行俄幣，她義憤填膺。⁴¹很明顯，單士釐遊記中很少出現王鳳嫻那種賞美景以娛心目的描寫與自憐自歎的感傷情緒，她更關注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這使她的書寫更富於「男性」氣息。在傳統社會陰／陽二元對立的規則下，男性的書寫是面向家國天下的、大膽而富有激情的；女性的書寫則是面向內闈的、柔媚而脆弱的。當男人用「女性」的書寫方式來創作時，總要被抨擊格調低下。相反，當女性用「男性」的書寫方式進行創作，或許仍會有些「不合規矩」的爭議存在，但更容易以「女中丈夫」的身份在文壇取得一席之地。單士釐像她的一些女性文學前輩們一樣，盡力去以「男性」方式來寫作，這使得她的遊記甚至比男性更「男性化」。

³⁷ 錢單士釐：《癸卯旅行記·歸潛記》，頁84。

³⁸ 單士釐：《受茲室詩稿》，頁38。

³⁹ 相關的文章有梁啟超於1896年發表的〈論女學〉和康同薇於1898年5月和9月發表的〈女學利弊說〉。參季家珍（Joan Judge）著，楊可譯：《歷史寶筏——過去、西方與中國婦女問題》（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1），頁107-108。

⁴⁰ 錢單士釐：《癸卯旅行記·歸潛記》，頁64。

⁴¹ 同上注，頁67。

以上種種女性書寫禁忌焦慮，使得單士釐在遊記中不斷塑造自己作為女德教化者、從夫的賢內助、憂國憂民的士大夫這三重形象，以證明自身書寫的正當性。或者如梅家玲在〈誰在思念誰〉中提出的，後繼者重複扮演著「傳統」女性角色建構出僵化的「性別身份」，並反過來支配、規範了真正女性的言行模式。⁴²

2. 國族「大」書寫下隱含的「小自我」

儘管單士釐儘量以「男性化」的筆調寫作，我們仍不難從文本細節中體會到她的真實情感。特別是在對國家的反思方面，在直抒胸臆之餘，也不乏含蓄的諷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單士釐看到了庚子年俄兵佔領甯古塔時副都統訥蔭（?-1907）獻媚於俄國的「豐碑」，她以譏諷的筆調寫道：

訥蔭，滿洲世僕，其忠順服從，根於種姓，見俄感俄，正其天德，但文字非其所長也，不知何地某甲，為捉刀此綺麗詞章。⁴³

這種類似的反語手法同樣出現在單士釐念及海參崴本為中國所有時：

海參崴者，……此為咸豐十年（1860）所「贈」與俄國者，俄建為東方第一之重要軍港，而附設商港。自光緒廿四年（1898）又「慨贈」遼東半島與俄，於是旅順大連灣為俄人東方不凍之第一良港，而海參崴次之。⁴⁴

作為官員的妻子，單士釐自然不宜對政府的作為表現出不滿，但喪權辱國的屈辱又使她心緒難平，於是她便以這種曲筆表現出自己的心聲。

儘管單士釐有意的克制了對清廷的不滿，但我們仍可從一些細節中探尋蛛絲馬跡。在日本東京博覽會上看到臺灣館的物產時，她大為讚歎：

曰臺灣館，凡臺灣物產、工作皆列焉。觀其六七年來工作，與夫十年前之工作相較，其進步之速，令人驚訝不已。昔何拙，今何巧，夫辦事在人為耳、草席、樟腦、蔗糖、海鹽，尤今勝於昔。⁴⁵

日本統治下的臺灣進步迅速，處處強於清廷統治時期。所謂「辦事在人」，單士釐原意在讚揚臺灣，卻無意間諷刺了清廷官員的無能，這與她厭惡的中國「官場習氣」是相通的。或許是受到錢恂的感染，身為使節夫人的單士釐對中國的官僚評價較低。「關役又盡西人，語言不通，且或染中國習氣」；⁴⁶「張君為郵船會社中人，無中國官氣」；⁴⁷「關君粵人，商此港廿年矣，明事理，無中國官氣」。⁴⁸從這些細節中，我們更能感受到她感情的流露，她對國家前途的憂心忡忡。

⁴² 梅佳玲：〈誰在思念誰——徐叔、鮑令暉女性思婦詩與漢魏六朝「思婦文本」的糾結〉，載張宏生、張雁編：《古代女詩人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129-144。

⁴³ 錢單士釐：《癸卯旅行記·歸潛記》，頁51。

⁴⁴ 同上注，頁46。

⁴⁵ 同上注，頁26。

⁴⁶ 同上注，頁39。

⁴⁷ 同上注，頁40。

⁴⁸ 同上注，頁48。

當然，單士釐的旅途中並不總是充滿憂慮與沮喪，她本人的性格在遊記中也有所體現。旅行中總有種種不便，對於旅途中出現的困難，單士釐表現出積極良好的心態，苦中作樂。

3月23日，單士釐夫婦乘坐的輪船觸礁，船底受損，同船的旅客都倉皇失措，只有「外子不為動，予亦安坐餐室。」⁴⁹「又此車有浴室，每人價二盧，而水濁逾黃河。雖然，究勝不浴，亦增愉快。」⁵⁰以上的描寫都能使我們感到單士釐是一位積極勇敢，幽默樂觀的女性，只不過她的個性隱藏於對國族命運的「大」書寫中不易被察覺。

三、結語

裘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指出：社會性別具有表演性，意味著各種實際行為中不存在本體論的狀態。人們表現出來的行為與姿態、被限制的欲望創造出了一個關於內向的、有組織的性別內核的假像，而話語維繫著這一假像，以便將生理性別牢牢控制在異性生殖的規則之下。⁵¹拋開先入為主的判斷，我們不難發現，單士釐的書寫方式並不具備傳統觀念中的「男遊女怨」、「男陽女陰」這些特質，相反的，她的作品中不僅不乏理性的觀察，其對社會的關心甚至超出了一些同時期的男性作家。這種比男性作家更「男性化」的書寫方式更像是一種對男性書寫方式的模仿；一種對女性書寫禁忌焦慮的防禦；一種對社會性別角色的表演。

作為一個處於變革時代的傳統閨秀，單士釐的思想是十分複雜的。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如果不將其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通過多個維度來考察，難免會以偏概全，得出片面的結論。對單士釐書寫方式的再審視，有助於我們更好地了解單士釐的思想及成因，與晚清這一轉折時期儒家傳統與現代思想如何在單士釐這樣的知識分子心中碰撞。本文囿於時間和能力之限，不能也不可能完全客觀地全部還原單士釐的思想觀念，但我們可以通過對《癸卯旅行記》的研究更好地理解單士釐的形象，畢竟一切形象源於對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關係的自覺意識之中，即使這種意識是十分微弱的。⁵²

⁴⁹ 同上注，頁32。

⁵⁰ 同上注，頁83。

⁵¹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175.

⁵² （法）達尼埃爾－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著，蒯軼萍譯：〈形象學理論研究：從文學史到詩學〉，載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203。